

# 康成与石美玉 在中国的行医生涯

论性别、种族与民族的跨文化边界

**The Chinese Medical Ministries  
of Kang Cheng and Shi Meiyu**

On a Cross-Cultural Frontier of Gender,  
Race and Nation

[美]Connie A. Shemo 著

程文 涂明华 译



科学出版社

# 康成与石美玉在中国的行医生涯

论性别、种族与民族的跨文化边界

The Chinese Medical Ministries  
of Kang Cheng and Shi Meiyu

On a Cross-Cultural Frontier of Gender,  
Race, and Nation

〔美〕Connie A. Shemo ○著

程文涂明华 ○译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图字：01-2015-5616号

Copyright ©2011 by Connie A. Shemo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except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passages in a review.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Rowman & Litterfield Publishing Group 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 LLC.

##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一部中美文化交流史专著，原作者施康妮女士（Connie A. Shemo）是纽约州立大学普拉茨堡分校（SUNY Plattsburgh）历史系教授。本书主要探讨了康成、石美玉两位现代中国杰出女性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数十年间的行医济世生涯。

作为中国现代大变局中两位曾经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女性，康成和石美玉的医疗事业折射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美文化交流中的诸多问题，涉及妇女史、中美关系史、现代中国史、基督教传教团史、医学史等关于妇女的诸多观念如何跨越国界而流传的问题。

本书史料扎实，史论结合，富于历史洞察力。施康妮充分掌握和利用了第一手资料，除了档案、传记等基本文献，还查证了一些以前的学术研究从未涉及的资料，并走访了认识康成和石美玉的人士，依据扎实的史料，通过对史实的分析，进行理论思考和提炼，提出独立的见解，从而使本书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学术性。

本书适用于对中国近代史、中美文化交流史、妇女史、医学史感兴趣的读者参阅。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康成与石美玉在中国的行医生涯：论性别、种族与民族的跨文化边界/（美）施康妮（Connie A. Shemo）著. 程文，涂明华译.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3  
书名原文：The Chinese Medical Ministries of Kang Cheng and Shi Meiyu: On a Cross-Cultural Frontier of Gender, Race, and Nation

ISBN 978-7-03-051767-8

I. ①康… II. ①施… ②程… ③涂… III. ①康成（1873-1931）-生平事迹  
②石美玉（1873-1954）-生平事迹 IV. ①K8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9728号

责任编辑：张 达 / 责任校对：贾伟娟

责任印制：张 伟 / 封面设计：铭轩堂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印制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年3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B5

2017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6 1/2

字数：340 000

定价：7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 致 谢

我在就读纽约州立大学宾汉顿分校研究生院的第一年，就开始寻找一个能够涵盖中美妇女交流史的课题。我的新导师基蒂·斯克拉（Kitty Sklar）建议我阅读简·亨特（Jane Hunter）的《优雅福音》（*Gospel of Gentility*）。在那本书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有关康成和石美玉的章节，她们以爱德·康（Ida Kahn）和玛丽·斯通（Mary Stone）医生而知名。让我异常兴奋的是，在查阅档案资料时，我发现了越来越多有关康成和石美玉的文献资料，以至于我最后决定写一部集中研究她们医疗生涯的专著。随着本书逐渐成型，我对导师的热情支持和鼓励充满了深深的感激之情。

约翰·查菲（John Chaffee）也从项目开始就参与研究，指导我研究中国历史，鼓励我学习中文，耐心地指导我翻译中文资料。纽约州立大学宾汉顿分校的其他教工和学生也帮助我进行此项研究，包括范发娣（Fa-ti Fan）、纳扬·沙阿（Nayan Shah）、汤姆·达布林（Tom Dublin）和萨拉·艾尔伯特（Sarah Elbert）。陈祖燕（Chen Zuyan）花了大量时间帮助我学习古汉语。我的研究生同学米歇尔·库尔（Michelle Kuhl）、卡罗尔·福克纳（Carol Faulkner）、布伦达·迈尔斯（Brenda Myers）、萨拉·博伊尔（Sarah Boyle）、苏隆达·冈萨雷斯（Surronda Gonzalez）、劳拉·墨菲（Laura Murphy）和安妮·德鲁尔（Anne Drouse）给了我富有价值的反馈。芭芭拉·雷韦斯-艾灵顿（Barbara Reeve-Ellington）几乎通读全书，给了我关键性的批评、支持和鼓励。

当我把博士论文改写成本书的时候，我从许多阅读、评论和参与讨论本课题的学者反馈中受益匪浅。简·亨特、塔尼·巴洛（Tani Barlow）、丹尼尔·贝斯（Daniel Bays）、杰西·卢茨（Jessie Lutz）、卡罗尔·哈尔敏（Carol Harmin）、弗兰克·科斯蒂里奥拉（Frank Costigliola）、达纳·罗伯特（Dana Robert）、杰伊·塞克斯顿（Jay Sexton）、伊恩·蒂勒尔（Ian Tyrrell）、鲁伊·柯西娅玛（Rui Kohiyama）、诺里科·石井（Noriko Ishii）和王秀云（音译，Hsiu-yun Wang）都阅读了论文或出席了论文报告会，提出了重要的问题或精彩的观点，这篇论文后来成为本书的一部分。王秀云还慷慨地与我分享伯特利护士学校的年鉴。我在普林斯顿大学任讲师的三年中，同苏珊·纳昆（Susan Naquin）、琼·贾奇（Joan Judge）、胡英（Hu Ying）、丹尼尔·本德（Daniel Bender）和利娅·哈格多恩（Leah Hagedorn）等人的交谈帮助我提炼出本书的主题。在我将博士论文改写成可读的专著的过程中，露丝·洛加斯基（Ruth Rogaski）阅读

了我的论文并提出了重要见解。保罗·克雷默（Paul Kramer）和安娜·布劳德（Anne Braude）阅读了我参与编辑的一卷本《倾轧的王国：女人、布道会、民族及美国新教帝国》（*Competing Kingdoms: Women, Mission, Nation and the American Protestant Empire*）中的一篇关于康成和吴格矩（Gertrude Howe）的论文，他们的评论和建议丰富了本书的整体内容。

纽约州立大学普拉茨堡分校的同事为我完成本书提供了重要支持。该校历史系为我完成本书给予了极大帮助。我在伦理研究所及汤姆·莫伦（Tom Moran）和道格·斯科普（Doug Skopp）举办的研讨组待了一学期，这为我提供了写作本书的工作时间，促进了关于本书的讨论。我在此对研究组成员杰沙敏·纽豪斯（Jessamyn Neuhaus）、康妮·奥克斯福德（Connie Oxford）、劳伦·伊斯特伍德（Lauren Eastwood）、莫妮卡·奇奥巴努（Monica Ciobanu）和伊丽莎白·凯特娜（Elizabeth Ketner）表示无尽的感谢，他们几乎阅读了本书的每一章节；同样还要感谢杰夫·霍尼布鲁克（Jeff Hornibrook），他对其中的某些章节提出了反馈意见。

如果没有档案管理工作人员耗费时间和精力帮助我查找有关康成和石美玉的资料，本书难以完成。洛克菲勒档案中心的托马斯·罗森鲍姆（Thomas Rosenbaum）和莫妮卡·布兰克（Monica Blank）、宾夕法尼亚医学院妇女与医学特别档案馆的史蒂夫·佩兹迈（Steve Peitzman）和芭芭拉·威廉姆斯（Barbara Williams）、耶鲁神学院图书馆特别馆藏部的琼·达菲（Joan Duffy）、纽约州立大学阿尔班尼分校特别馆藏部的玛丽·奥西尔斯基（Mary Osielski），以及史密斯学院的索菲娅·史密斯馆藏部的档案管理工作人员，都为我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帮助。感谢艾米·菲奇（Amy Fitch）在最后时刻为本书引文提供帮助。尤其要感谢美国国家卫理公会档案馆的马克·谢尼斯（Mark Sheise），他在几年中给我回复许多电子邮件，花费大量时间研究解答我有关卫理公会传教士的问题，并尽可能为我提供写作本书需要的馆藏资料。

从不同组织得到的资助使我得以成行去查找有关档案资料。洛克菲勒档案中心为我提供了研究基金，妇女与医学特别档案馆为我提供了路易斯·格洛克纳研究员基金（Louise Glockner Fellowship），资助我在该馆进行了六周的研究。普林斯顿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普拉茨堡分校为我提供了基金以进行某些终期研究。

我很幸运得以会见那些与康成和石美玉有私交的人士，他们乐于谈论对这两位女性的回忆。胡贝蒂（Betty Hu）是石美玉和胡遵理（Jennie Hughes）的养女，伯特利教会前会长，尽管身体欠佳，她还是通过信件回答了我许多问题。赫斯特·布朗·希

尔 (Hester Brown Hill) 是一对传教士夫妇的女儿, 其父母曾与石美玉和康成两人共事, 母亲与康成尤其亲近, 允许我拜访她, 在家里热情地招待我, 分享她对康成及其在南昌传教士团体中生活情况的回忆。成露丝 (Ruth Soong) 是伯特利教会成员, 曾见过石美玉, 让我对伯特利教会在石美玉辞世之后的演变有了体会, 她还慷慨地邮寄给我她收藏的石美玉和胡遵理相关材料。杰克和朱多丽 (Doris Tsu) 热情地招待我在加利福尼亚州度过整个周末, 诉说他们对石美玉和胡遵理的回忆。朱多丽还告诉我有关石美玉的侄孙女菲比·索坎 (Phoebe Sorkan) 的消息, 菲比接受了我的电话访问, 并有信件往来, 给了我有关她姑婆和胡遵理关系的第一手资料。

好几个人就我的研究与我联系, 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来自隶属于 UNISON 公共服务联盟 (UNISON the Public Service Union) 的英国伦敦护士联合会的迈克尔·沃克 (Michael Walker), 邮寄给我一些 20 世纪 20 年代的英国护理杂志, 提供了伍哲英晚年生活的更多信息。斯坦利·克劳福德 (Stanley Crawford) 是一对熟识石美玉的传教士夫妇的曾孙, 他证实了一些重要细节, 还与我分享了他收藏的照片。

陈春燕 (Chun-yen Chen) 是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助理, 为本书所用的许多中文资料提供了译文。虽然我也会自己去查阅所用的中文资料, 但她的译文仍是重要的向导。我还要感谢罗伯特·提格诺尔 (Robert Tignor), 他是当时的系主任, 帮助我获得了聘用一名翻译助理所需的资助。

完成本书最终修订所需的时间来自瑙拉·迈克甘·德雷舍尔博士 (Dr. Naula McGann Drescher) 的反歧视行动休假项目 (Affirmative Action Leave Program)。感谢系主任温迪·戈登 (Wendy Gordon) 帮助我获得此项资助, 感谢她对该项目的支持。

本书是由凯瑟琳·罗德维克 (Kathleen Lodwick) 编辑的在华传教士系列图书中的一部。凯瑟琳是首批阅读我的博士论文终稿并就其出版的潜质对我加以鼓励的人之一, 她强调一定要大加删减, 以写成一部篇幅小得多的著作, 并就删减何处给了我明确建议。我要感谢利哈伊大学出版社 (Lehigh University Press) 的经理司各特·保罗·戈登 (Scott Paul Gordon), 当我提交这部书稿以供出版时, 他对我加以指导并及时回复邮件; 同时感谢罗曼与利特菲尔德出版社 (Rowman & Littlefield) 的詹尼斯·布劳恩斯坦因 (Janice Braunstein)。

在本书写作期间, 我得到了各位亲朋的许多帮助。罗恩 (Ron)、阿布图斯·赛德 (Arbutus Sider)、鲍勃·罗德斯 (Bob Rhodes)、凯特·温克勒 (Kate Winkler)、格兰特 (Grant)、安-玛丽·莫丽塞 (Anne-Marie Morrissey)、林恩·切利恩 (Lynn Cherian)、

提撒·温格 (Tisa Wenge) 都在我查阅档案时招待我在他们家住宿。我的公婆比尔 (Bill) 和艾伦·费舍尔 (Ellen Fischer) 让我的双胞胎儿子在他们家度过了许多个周末, 以便让我有时间不受打扰地写作, 我丈夫的姐姐艾伦·费舍尔·波普 (Ellen Fischer Bopp) 和其丈夫布莱恩·波普 (Bryan Bopp)、侄子亚历克斯 (Alex) 和丹尼尔 (Daniel) 也这样帮我带过小孩。我母亲爱丽丝·舍默 (Alice Shemo) 的帮助, 包括照看小孩、操持家务, 以及详尽校对, 对本书的出版至关重要。她还是个杰出的宣传家, 说服许多人在本书出版之前就先睹为快。

我在接触康成和石美玉研究之后不久, 就邂逅了我的丈夫——威廉·费舍尔 (William Fischer), 他在我试图更深入地了解康成和石美玉的探索 (有人也许会说是执迷) 期间一直陪伴着我。多年来, 我们的无数个“假期”都是他开车陪我前往各档案馆或访谈。我对他的爱与支持的感激之情实在无以言表。我还想对我的双胞胎儿子基尔南 (Kiernan) 和罗利 (Rory), 以及刚出生的女儿米拉 (Meara) 道谢, 他们把我带出过去、带往当前, 给我的生命带来了更多的爱和欢乐。

谨以此书纪念我的祖父母爱丽丝 (Alice) 和多米尼克·舍默 (Dominick Shemo)。我的祖父在 2010 年 1 月逝世前读过本书的初稿, 他是最热诚的支持者之一。他不但坚信人们将乐于读我的书, 而且告诉我根据这本书的故事可以创作出一部了不起的电影。我真希望祖父母在世时能见到本书的出版。

## 缩 略 语 表

**CCCM:** Minutes of the Central China Conference, General Board, UMA. Continued as KCM (Kiangsi Conference Minutes) after 1914. (Kiangsi Conference formed and split from the Central Conference.)

(华中教会联合会议事录)

**CCWCM:** Minutes of the Central China Woman's Conference, UMA. Continued as KWCM, Minutes of the Kiangsi Woman's Conference, after 1914. (Kiangsi Conference formed and split from the Central Conference.)

(华中女子教会联合会议事录)

**EAHD:** Eliza Anne Hughes Davis Papers, Department of Special Collections, University of Oregon Library System.

(伊莉莎·安娜·休斯·戴维斯论文集)

**FRB:** Fred R. Brown Papers, M. E. Grenander Department of Special Collections and Archive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

(弗雷德·罗·布朗论文集)

**HW:** Hyla Watters Collection, 1892-1991, Collection Number: MS 239, Sophia Smith Archives, Smith College, Northampton, MA.

(海拉·沃特斯收藏)

**RAC:** Rockefeller Archives Center, Sleepy Hollow, NY.

(洛克菲勒档案中心)

**SCAWM:** Special Collections and Archives on Women and Medicine, Medical College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妇女与医学特别档案馆)

**UMA:** United Methodist Archives, Drew University, Madison, NJ.

(联合卫理公会档案馆)



**WFMS minutes:** Annual Reports of the Woman's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Annual Meetings, UMA.

(妇女海外布道会年度会议报告)

**WRJ:** William R. Johnson Papers, Special Collections,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New Haven, Connecticut.

(威廉·罗·约翰逊论文集)

# 目 录

致谢	
缩略语表	
绪论	1
第一章 “只要别再盯着我们的双脚，我就太高兴了”	16
第二章 “基督徒和异教徒的所有差异”	40
第三章 “培养本土力量”	64
第四章 “中国新生的唯一希望”	91
第五章 “她怎样才能更好地报效国家？”	111
第六章 “出类拔萃，尽善尽美”	126
第七章 “由中国妇女掌控，为中国妇女造福”	154
第八章 “再也找不到更忠诚的中国公民”	176
第九章 “我们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	206
结论	228
参考文献	231
附录	245
附录 1 康成、石美玉生平大事纪年表	245
附录 2 记江西康女士	246
附录 3 论女学	247
后记	253

## 绪 论

1896年，两名26岁的中国女子在华中地区通商口岸九江市开设了一家为妇女儿童提供西医治疗的诊所。她们刚刚从密歇根大学医学院毕业，作为传教士医生返回祖国，隶属于妇女海外布道会（Women's Foreign Mission Society），亦即美以美会妇女执事会（the women's board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她们的壮举和远见极大地激励了九江人民，更广泛地鼓舞了全中国的民族主义改良派，还跨越国界引起了关心海外布道会的美国人士广泛而持久的兴趣。她们的中文姓名是康成和石美玉，在英语国家中则以爱德·康（Ida Kahn）和玛丽·斯通（Mary Stone）医生而闻名，她们创办的诊所和医院每年收治几千名妇女和儿童。她们的范例吸引了许多中国妇女成为医生，为中国妇女打开了医疗职业的大门。此外，她们还在中国建立护理专业的过程中发挥了中坚作用。

这是第一部关于康成和石美玉医疗事业的专著<sup>1</sup>。从广义来说，本书有助于跨国界妇女史的发展，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关于妇女的诸多观念如何跨越国界而流传的理解。本书不仅影响着妇女史和妇女研究，而且影响着美国对外关系、现代中国史、基督教布道会史及医学史的研究。我把对康成和石美玉的研究作为阿基纳·伊里尔（Akira Iriye）定义的“人类或全球史”的一部分，它聚焦于“人类的迁徙”与“文化的借用与转化”<sup>2</sup>。

康成和石美玉从儿童时代起就在学习文化谈判的艺术。她们长大后通晓双语，和通商口岸九江的美国传教士社区关系密切。康成被美国女传教士吴格矩收养，石美玉的父亲石宅岬是江西省首批卫理公会华人本堂牧师之一，在他的极力主张下，吴格矩违背了当时处于支配地位的教会政策，为她们提供了西式教育，包括强化英语学习，以便为她们日后进入美国医学院做准备。

她们在这个文化交界面（cultural interface）上有时候处境艰难。她们不同寻常的教育，以及未裹的双足，使她们难以融入同龄的中国女孩，常常成为人们好奇的对象。她们深受导致美国传教士之间产生隔阂的教会排外行为之苦。然而她们掌握了作为文化译员的有用技能，这使得她们的医疗事业能够得到中美两国人民的广泛接受。她们综合了美国传教士和中国改良派的思想观念，开创了她们对中国妇女作为医生和护士

从事医疗事业为建设新中国作贡献的新构想。

作为妇女海外布道会中的华人女传教士，康成和石美玉占据着一个非同寻常的位置。很少有中国人，无论男女，自己成为传教士（相比传教士的助手而言）。康成和石美玉在 19 世纪晚期由妇女海外布道会资助接受医学教育的四位女医生中最为知名。一项关于美国华人留学生的研究称这些女子为“医生”，确认她们是在美国留学的首批四名女性<sup>3</sup>。她们在美国和中国都受到人们的爱戴，而康成和石美玉最为受人瞩目。1897 年，即她们归国后第一年，改良派梁启超撰文称康成为中国“新”妇女的典范，文中也述及石美玉。有志于改革的中国人撰写有关康成的诗歌，小说家以她为原型创作小说<sup>4</sup>。有多篇关于康成和石美玉的文章在美国教会出版物上发表，由她们自己发表的则更多<sup>5</sup>。几乎每一个参与妇女海外布道运动（19 世纪晚期和 20 世纪初期最大的妇女运动，到 1915 年为止有 300 万成员）的人都至少对康成和石美玉略知一二，她们被许多人视为女英雄<sup>6</sup>。

由于中美两国的文化转变，她们在两个国家的声望逐渐下降，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已几乎被遗忘。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美国，妇女海外布道运动的成员人数减少，日渐式微<sup>7</sup>。此时中国妇女有更多的职业可选择。像秋瑾这样的女革命家，因为试图推翻清王朝于 1907 年被处死，比康成和石美玉更为人们所熟知。由于康成和石美玉公开反对妇女从事任何军事活动，她们从代表妇女择业的最新前沿走向反对某些新兴职业。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大多数学术研究将西方慈善家，尤其是基督教传教士描绘为不可救药的“文化帝国主义”<sup>8</sup>。在这种学术氛围中，康成和石美玉被人遗忘了。

20 世纪 80 年代，人们对康成和石美玉的关注度有所回升。简·亨特于 1984 年出版了《优雅福音》，研究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来中国的女传教士的事迹，其中包含了康成和石美玉。此后，其他学者关于她们的论述散见于一系列主题更为广泛的著作中，包括在美国的华人留学生、女传教士中的文化帝国主义思想，以及中国人对西方妇女观的阐释和翻译<sup>9</sup>。同时，新中国学者重新开始关注中国的基督教布道会。尽管并不质疑基督教会和西方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学者们还是发现教会在许多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中国建立女子学校，以及引进西方医学。这些领域的学术研究肇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曾简略提及康成和石美玉，认为她们是开办女子教育及向中国妇女介绍西医的先驱<sup>10</sup>。中英文学术文献一样，常常把康成和石美玉描绘成相对保守的人物，强调她们反对妇女参加军队服务，并把她们和 20 世纪初期出现的更加

激进的女革命家相比较<sup>11</sup>。

大多数关于康成和石美玉的学术著作主要依赖三方面资料：一是美国联合卫理公会档案，保存了所有妇女海外布道会传教士的档案资料；二是中国改良派领袖梁启超撰写的一篇论康成的文章，其中也提及石美玉；三是1912年出版的《现代中国杰出女性》，内有康成和石美玉的传记<sup>12</sup>。郭佩兰（Pui-lan Kwok）对中国女基督徒进行了极为广泛的研究，依据康成和石美玉在教会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对她们的传教观念进行了更为充分的分析<sup>13</sup>。胡英（Hu Ying）把康成视为中国改良派的典范，通过探讨一部其中有一个以康成为原型的人物的长篇小说，提供了更多的中国背景知识，她还采用了康成用中文撰写的养母吴格矩的传记<sup>14</sup>。关于康成和石美玉的中文研究成果则主要是依据1934年对康成和石美玉的工作所做的总结及梁启超的文章，另有少量文章引证《现代中国杰出女性》和简·亨特的著作<sup>15</sup>。

除首次把所有这些文献资料汇集到一起以外，本书还引用了一些之前的学术研究尚未涉及的资料。这些资料分为五大类：第一，本书是第一部依据康成和石美玉的医疗工作年度报告及妇女海外布道会对她们工作的总结写成的著作。第二，本书广泛采用曾与康成和石美玉共事的美国传教士的书信。第三，对于1914年后这一时期，洛克菲勒档案中心在其中国医疗事业调查中保存有康成和石美玉的资料。第四，我查阅了石美玉创办的独立医院和护士学校的出版物，1920年以后则称为伯特利教会（Bethel Mission）。第五，我有幸会见了一些认识康成和石美玉的人士。

我的研究开始于康成和石美玉的童年，即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此时，单独的女传教士执事会开始建立（妇女海外布道会属于最早成立的一批，始创于1869年），结束于1937年抗日战争期间石美玉离开中国（康成歿于1931年）。自19世纪早期美国海外传教事业发轫之初，一些新教布道会的理事会就设想美国妇女要在传教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在许多国家上层妇女不允许接触西方男子。从19世纪中期开始，美国联合卫理公会开始专注于“异教母亲”的皈依。这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基督徒母亲是建立基督徒家庭的要素，而基督教家庭又是新基督教中国的基石<sup>16</sup>。

最初，美国布道会执事会把劝中国妇女皈依的任务指派给传教士的妻子。但是，新教传教士的妻子承担着抚养子女的责任，同时还承担着在异国他乡建立她们自己的“基督教家庭”这一更加模糊而重要的任务。因此，尤其是子女出生之后，传教士的妻子没有能力投入太多时间去做传教工作<sup>17</sup>。在传教领域中对单身女性的需求显著增长，与此同时，在美国受过教育的单身女性数量也在增长。美国在美洲大陆的领土扩

张导致了对低收费公办学校教育需求的增长。稳定供应低收费教师的需求打开了美国妇女从事教师职业的大门，结果出现了更多像曼荷莲女子学院（Mt. Holyoke）这样的精英女子学院，同样出现了更多由政府赠予土地并同时为男女生开放的学院<sup>18</sup>。

由于大多数主流新教宗派都不允许妇女布道，因此新的妇女执事会主要致力于教育。然而，大约3%的女传教士是医生<sup>19</sup>。即使是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医疗工作也是布道会执事会最昂贵的投入之一，因此，只有那些最大的、受捐助最丰厚的主流新教执事会才建起了门诊部和医院。妇女海外布道会，作为最大和最独立自主的妇女布道会执事会，是最倾力参与医疗事业的教会组织之一<sup>20</sup>。

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前10年，针对中国妇女的布道会医疗事业稳步发展。女传教士医生也能够通过对中国妇女处境的感人描述筹集到资金，那些中国妇女在她们自己的医疗传统内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完全依赖西方女医生才能得到治疗<sup>21</sup>。医治中国妇女对于教会宣扬西医优于中医至关重要。这一描述植根于对中国妇女求医途径的根本误解。许多学者已经证实中医传统中存有大量文献阐述妇女健康问题<sup>22</sup>。在印度，英国官员经常强调妇女受到的压迫，以证实殖民的合理性，用格雷亚特里·查克拉沃特利·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的话来说，就是描绘出一幅“白人男子从棕种男人那里拯救棕种女人”的图景<sup>23</sup>。然而中国从未成为任何国家的殖民地。我认为通过宣扬完全无法获得任何医疗保健的妇女形象来促成中国“门户开放”，这更加符合美国人的口味，而所谓“门户开放”是通过明目张胆的西方威胁实现的。

欧洲血统的妇女（“白人”妇女）能够利用这些在非西方国家里受压迫妇女的形象来证明她们自己有正当理由接受教育、谋求职业，以及更普遍地进入公共空间。针对中国妇女的布道会医疗工作提供了绝佳的例证：“中国妇女不能看男医生”这一观念成为妇女在美国接受医学教育的强有力理由。西方妇女救世主形象的构建有种族因素。正如琼·雅格布斯·布伦伯格（Joan Jacobs Brumberg）在她关于美国女传教士的文章中所指出的，描绘在异教社会中饱受磨难并急需美国妇女拯救的女性形象，“标志着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种族处于社会进化阶梯中的上层”<sup>24</sup>。

在英国妇女史的领域中，女权、帝国主义及种族之间的联系已经得到充分阐述，正如英国的存在从未受到争议<sup>25</sup>。探索美国妇女如何既得益于又贡献于帝国主义话语的最早期研究，就已经关注到了美国女传教士<sup>26</sup>。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随着美国历史学家更加关注美国，越来越多研究美国妇女的历史学家已经专注于这一主题，不再局限于美国传教士，而是面向更广义的妇女组织，包括主张妇女选举

权的组织<sup>27</sup>。

这一学术成果对挑战不容置疑的全世界妇女亲如姐妹的假想非常重要<sup>28</sup>。然而，同样重要的是探索其他文化中的妇女如何阐释“妇女工作为妇女”的观点。仅仅强调西方妇女是帝国主义及构建种族等级制度的同谋，让参与这些事业的非西方妇女除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受骗者之外不能扮演任何其他角色。

因此，为了理解康成和石美玉的医疗工作，重要的是不仅把她们看成是美国传教事业的参与者，而且要把她们当作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新教社区的一员。近来关于中国基督新教的学术成果质疑以前对中国新教徒背井离乡者形象的描绘。实际上，许多基督徒深深地卷入了民族主义运动，批判外国帝国主义，即便他们同时也相信存在超越国界的基督徒社区<sup>29</sup>。康成和石美玉的医疗事业符合中国民族主义改良派的新中国构想，也同样符合美国传教士的思想意识。

像梁启超这样的改良派撰文抨击中国对西方列强，以及在 1894—1895 年中日战争中对日本的军事失利，并将其原因部分归咎于妇女缺乏教育和缠足习俗<sup>30</sup>。依据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梁启超和其他人认为这些习俗削弱了中国女性，使她们不能养育出能够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强壮后代。与此同时，在 19 世纪末，改良派还批判中国卫生保健现状，指责政府忽视公共卫生，从而使民族趋于衰弱。对亡国灭种的恐惧，使这些改良派赋予妇女健康，尤其是生殖健康特别高的价值<sup>31</sup>。尽管梁启超总体上倾向于中西医结合，却热忱支持康成和石美玉为中国妇女创办西医诊所。

在传教士和中国改良派的文章中，中国妇女基本上是以受害者的面貌出现（在传教士眼中是异教的受害者，在改良派眼中是儒教扭曲人性的受害者）<sup>32</sup>。作为“文化转译者”，康成和石美玉吸收了中国改良派和美国传教士的思想，把中国妇女塑造成积极主动的医者形象<sup>33</sup>。在向中外读者展示她们的医疗事业时，康成和石美玉总是强调她们的诊所（后来是医院）是由中国妇女管理（她们自己和她们培养的护士）的。她们对中国人自己管理诊所的强调，明显地同民族主义思想相联系，巧妙地挑战了美国传教士社区的种族观念，这种观念使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中国基督教徒管理布道会机构的能力产生极大的怀疑。她们的重心是要由妇女管理诊所，这吸收了美国海外妇女布道运动的观念，为中国妇女在新中国建设中构建了一个比梁启超最初的设想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通过融合中国民族主义改良派的思想意识和美国妇女的福音政治文化观念，康成和石美玉力图为妇女构建“主体地位”，由此中国妇女既能够参与世界的福音事业，又能参加建设一个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国<sup>34</sup>。

本书对康成和石美玉的研究首次深入考察她们的居住条件及旅行情况，这为理解美国传教士如何与种族理论发生关系这一问题提供了新见解。一位学者指出，康成和石美玉与美国传教士住在一起的事实表明，尽管美国传教士可能在文化上有帝国主义倾向，但他们并不接受种族等级观念<sup>35</sup>。然而，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对占统治地位的“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信念，能够与下述观念并行不悖：民族之间的差异是由于文化的不同而不是生物学的不同<sup>36</sup>。大多数传教士尤其是妇女海外布道会的传教士坚持认为所有人在精神上一律平等，明确地拒绝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优越论，这当然是事实。可是更为仔细地考察康成和石美玉的居住条件及旅行情况，可以说明有关种族的思想意识是如何构成传教士的社区概念及更广义的超民族基督教大家庭概念的。关注康成和石美玉的居住条件及旅行情况还有助于解释妇女海外布道会为什么没有继续派中国妇女去美国学医以便让她们管理布道会医院，尽管他们宣称传教士社区一直在加强医疗工作。

本书也是第一次探索 1914 年之后在洛克菲勒基金会通过中华医学基金会（The China Medical Board, CMB）涉足向中国引进西方医学的计划时，康成和石美玉所面临的挑战。CMB 成员强烈反对单独设置妇女医院，认为它们缺乏效率。他们还认为单独设置妇女医院会危及他们建立女性护理职业的目标。将妇女医院并入综合性医院的进程，威胁到康成和石美玉建立由中国妇女独立管理的医疗事业的目标。康成和石美玉为保持她们的教会医院由自己控制所采取的不同方式，揭示了她们如何回应人们对女性肩负照料其他妇女及儿童的特殊使命这一观念的质疑。

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这一特殊使命观念的感召力大为减弱。学者们把这个时期看作妇女海外传教运动（及更广义的海外传教）的“衰退”时期之一。确实，在此时期，美国联合卫理公会的收入显著下降<sup>37</sup>。可是在美国联合卫理公会传教士社区内部，人们展开了公开辩论，话题涉及传教士种族主义、帝国主义，以及如何坚守全世界基督徒亲如兄弟姐妹的理想。在这一时期，在海外布道会中的中国基督徒和美国传教士同样遇到了几乎不被承认的种族等级思想意识，这些思想意识是众多传教政策的基础<sup>38</sup>。中日甲午战争及接踵而来的国共战争提前终止了这种交流的可能性，但它依然是任何关于帝国主义及美国在华传教事业的讨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书关注于康成和石美玉如何融合美国传教士和中国改良派的思想体系，并把它们呈现于更广阔的文化借用的语境之中，挑战那些把美国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作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描绘<sup>39</sup>。一些研究美国对外关系的学者已经质疑了文化帝国主义观点，



因为这些观点暗示从输出文化到接受文化的单向权力强加，而忽视了接受文化中的人们所拥有的解释和改编输入信息的能力<sup>40</sup>。这当然不是贬低美国海外传教运动的重要性，这一运动依赖美国权力的海外扩张<sup>41</sup>。然而，海外传教士并非简单地将他们的思想意识强加给一群被动的人。就妇女海外传教运动而言，传教士试图输出的“基督教女性”（“Christian womanhood”）概念在传教士中争议不断，并没有建立起统一的思想意识，同时还受到中国基督徒的影响和改变。

本书也探讨了向中国引进西方医学这一复杂而备受争议的过程。康成和石美玉的医疗事业提高了我们的洞察力，以理解西方生物医学的方方面面在中国如何适应和变化，尤其是在参与创建女性护理职业的过程中。我的意图贯穿全书，与布里迪·安德鲁斯（Bridie Andrews）关于中国细菌理论的著作意图相似，在那本书里她设法避免“那些强调西方医学真理价值或西方帝国主义霸权的强加，以及本土的抵抗与合作的解释”<sup>42</sup>。我不假定传教士医生提供的医疗必然优于他们的各种竞争者，尽管我认为他们带来了一些新技术，在许多情况下对病人是有益的。认为康成和石美玉将西医强加于不情不愿的民众，这一看法也有失偏颇。除了在特定时期和环境之外，如在“义和团运动”之后的某些通商口岸，没有哪个国家拥有将西医强加于中国人民的力量，如英国在印度或者美国在菲律宾那样<sup>43</sup>。

除了这些学术贡献以外，康成和石美玉都是颇有魅力的人，我期望把她们介绍给更多读者。我在本书中并不试图把她们表现为圣人或者为某一特别事业而鼓舞人心的人物，而是作为中美两国历史中的重要历史人物。我希望本书的读者乐于在她们的复杂中了解她们。

以下是有关几个名词的解释：“西医”和“中医”是指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都有许多内部争论，都在本书论及的时期不断演进和变化<sup>44</sup>。对1910年以前的时期，我使用“西方医学”（western medicine），部分原因是由于它是当时使用的权威术语，部分原因是由于“西方医学”和后来所谓的“科学化医学”（scientific medicine）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并不是同义词。在探讨20世纪20年代时，我使用“科学化医学”这一术语，因为此时生物学在西方国家已占统治地位，而越来越多从事西医的中国医生开始反对使用“西方医学”这一名称。

关于汉字拼音法，我使用拼音系统，因为它目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那些读者主要熟悉其威妥玛-翟理斯（Wade-Giles）形式的人名（如Chiang Kai-shek，蒋介石）是例外。当时传教士使用的是威妥玛-翟理斯拼音法。例如，石美玉用Shih Mei-yu或